

小說與新聞：當代中國的知識、文化、權力和媒介

●黃子平

分分合合

在中國，近代小說可以說是與近代媒介(報紙期刊)前後腳「誕生」的。小說跟新聞媒體，自始即結下不解之緣。報紙中刊載小說始於《申報》，在創刊的第一年(1872)就刊有〈談瀛小錄〉、〈一睡七十年〉、〈乃蘇國奇聞〉等小說。1897年，嚴復、夏曾佑為《國聞報》作〈本館附印說部緣起〉，計劃「廣為採輯」小說並「附紙分送」，這計劃雖未實行，卻是報紙文藝副刊的萌發。同年，上海的《字林西報》闢副刊《消閑報》，日出一張，隨報分送。此後，大部分報紙都騰出固定版面設置文藝副刊。有趣的是，此後出版的小說期刊雜誌，亦多以「某某報」的樣式命名，如：《新小說報》(梁啟超)、《小說七日報》(談小蓮)、《揚子江小說報》(胡石庵)、《小說月報》(譚鐵樵)、《小說叢報》(徐枕亞)、《小說新報》(李定夷)、《小說畫報》(包天笑)等不下十四、五種。

1949年以後，一體化的社會體制將文藝與新聞均歸入「宣傳部門」管轄，小說與報紙這種媒體的關係空前密切。這一點並不僅僅表現在整版整版地發表小說，同時配以重要社論或編者按來指導某一社會運動(50年代有李准的《不能走那條路》，60年代有王汶石的《沙灘上》)，更集中地表現在「報告文學」和「大型通訊」這種介乎小說和新聞之間的「蝙蝠式」寫作成為當代最重要的話語實踐。80年代以來，小說和新聞之間的關係變得微妙而又複雜。一方面，小說日益強調自身的所謂「藝術規律」(即「非宣傳性」)，試圖與新聞報導拉開距離。除了各地晚報仍連載中長篇小說以增銷路，作為主要新聞媒體的各家大型日報(包括它們的文藝副刊)已極少刊載小說。「文革」之後，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大中小型文學刊物，則在陰晴不定的政治氣候中靈巧機警地，年復一年，發表用與報紙語言迥然有別的文體寫作的形形色色的小說，諸如「尋

1949年以後，一體化的社會體制將文藝與新聞均歸入「宣傳部門」管轄，小說與報紙這種媒體的關係空前密切。

根」啦、「新潮」啦、「實驗」啦等等。另一方面，新聞與小說的互相滲透互相替代，卻又比任何時候都深刻和複雜。那些紊亂而又界定不明的衆多文體分類標籤就足以證明這一情勢：「紀實小說」（劉心武）、「真話小說」（遇羅錦）、「口述實錄文學」（張辛欣、馮驥才）、「全景報告文學」（蘇曉康、賈魯生）、「新新聞主義小說」（老鬼）等等。

「壓抑機制」說

文類的劃分是否只是文學史家的術語操作，以便他們歸納敘述？文類似乎一向並未享受到一視同仁的平等待遇，文類的秩序是一種等差秩序。有時是依據「量」：「史詩性的鴻篇巨著」／「一揮而就的應時小品」，似乎本文生產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即可體現其使用價值。有時依據「位」：「正史」／「稗史」，「時代的報告」／「小說家言」，「嚴肅小說」／「通俗小說」，衣分五色食分三等。文類的結構與現實權力關係之間，是否正有某些脈絡可供探尋？從這個角度討論小說和新聞這當代兩大寫作類型（為了方便我想把歷史寫作歸入新聞寫作之中——「舊聞」者昨日之新聞也——儘管其中仍有許多重要關節需要梳理），討論它們與當代中國文化、知識範型、權力和傳播媒體之間的種種關係，有哪些理論思路可供選擇？

一個最自然的（也就是說，最易被人接受的）思路是所謂「壓抑機制」說。在一個全權社會中，「真實」（或「真相」）被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生產、製作、分配和消費。被規定為「黨的喉舌和耳目」的新聞報紙，其國有化的程度極高。儘管「領導出思

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結合」方式曾喧囂一時，文學創作的「個體戶」性質始終難以消滅。相對來說，新聞寫作靠近權力秩序的中心，小說創作常處邊緣。在政治形勢嚴峻的年代，文學家們受到的清洗迫害似乎遠比新聞界的文人同行來得厲害——也許，這正是黨對邊緣寫作遲遲未能就範因而痛下決心的表現；也許，新聞界被征服得如此徹底，以至於更嚴重的壓制也罕為人知；也許，僅僅因為人們認定文學寫作理當享受寬鬆待遇，作家們的不幸才較之記者同行更引人注目，博得更多的同情和憤慨。甚至，在「改革開放」的十年裏，「創作自由」的口號可以在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作家代表大會致詞裏堂皇出現，而「新聞自由」的要求只能到街頭示威者的標語上去找。依據「壓抑機制」說，人們可以期待在邊緣寫作的小說中獲得相對來說較多的「真實」或「真相」，中心控制下的新聞寫作卻只能提供意識形態夢囈和謊言。至於「蝙蝠」們，報告文學啦，文學特寫啦，人們可以區別情況，將它們作為上述兩者的複雜的變種做一番辯證分析，或者是「新聞」利用「小說技巧」偷運意識形態宣傳，或者，反過來，「創作自由」的享有者們以「柔軟的鑽頭」鑿通障礙，仗義執言為民請命，使「真相」大白於天下。

「壓抑機制」說的吸引人之處，在於它允諾了一種解放。一旦壓抑被解除，我們將揭示真理，說出真相，直面人生，我們將迎接一個人人皆說真話坦誠相見的新時代，「瞞」和「騙」的文字將被掃蕩一空，我們將確切知曉自己的現實處境，在祛除了意識形態魔魘的世界上真實地生活。（顯然，「性」狀態的「壓抑假說」只是「真實」狀

「壓抑機制」說的吸引人之處，在於它允諾了一種解放。

態的「壓抑機制」說的一個鮮明特例。可以說，弗洛伊德理論的中心比喻直接採用「書報檢查官」等意象，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因此，法國哲人福柯在分析關於「性」的「壓抑假說」時所作的斷言，可以相當真確地移用於此：這種假說提供了機會讓我們能無拘無束地出口反叛現存秩序，預言極樂，將啟蒙、解放與多重的快感聯繫在一起，創出一種新的話語，將求知的熱情、改變法規的決心和對現世快樂的慾望緊密結合起來。(1)

「壓抑機制」說更重要的功能，在我看來，是提供一種令人確信無疑的解釋，回答並解除人們所觸摸不到的「真實」到哪裏去了的焦慮。無法確診的病症使人心焦，說出病名就能讓病人鬆一大口氣。「真實」是確實存在着的，我們只是受了蒙蔽，全怨「他們」一手遮天。「壓抑機制」說就這樣證明自己也是它所指斥的那個機制的一部

分，因為它同樣提供了一個「實體化」了的符號，把「不在的在」答允給人們，使人們得以在其中安身立命。

具體到小說和新聞在現實權力關係中的定位，由比附而來的分析使問題得到簡化，卻也昭現了「壓抑機制」說自身的壓抑性。「文學真實」、「藝術規律」的強調固然為小說家掙得更多的寬鬆，卻又加固所謂「純文學」的浪漫迷思，以此傲視塵世間六根不淨的新聞寫作。在顛覆一個中心的同時建立了另一個中心，將許多寫作者逐往邊緣。「純文學」的捍衛者與自嘲為「文學門外漢」的民生疾苦代言人之間，有着時隱時顯或正面或迂回卻日益針鋒相對的齟齬衝突。二元對峙的論辯往還，常常顯示出完全相同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範型，顯示出對「真」（或許還包括了「善」和「美」）的壟斷權的新的一輪爭奪，已在不同的寫作類型中展開。

「壓抑機制」說更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種令人確信無疑的解釋，回答並解除人們所觸摸不到的「真實」到哪裏去了的焦慮。



圖 福柯關於「性」的「壓抑假說」提供機會讓我們能無拘無束地出口反叛現存秩序，預言極樂，將啟蒙、解放與多重的快感聯繫在一起。

說在新聞寫作和小說寫作中都同樣存在着「壓抑 / 反壓抑」，問題的簡化並未得到根本解決。這只是將第一層的二元對峙移入第二層去而已。「壓抑機制」說對現實權力關係的圖象理解（「金字塔」）未作任何調整，卻得到更鮮明的描繪。「新聞」和「小說」在此種分析中變成類似於「新聞界」和「小說界」一類實體化的機制，而不是經由媒體呈現的一整套寫作及閱讀方式。「新聞」和「小說」作為一整套寫作與閱讀的策略，依據一時代的知識範型，依據不同的寫作、發表、出版、閱讀語境，在現實權力網絡中被形形色色的「局部中心」靈活而多變地運用的情形，是「壓抑機制」說難以看到並加以解釋的。

簡單地指明「壓抑機制」說在理論上「非真」並不解決問題，說「真實」從未受壓抑一向昭然於天下，更是愚妄之談，只配視為新聞管制和文化專制的辯護詞，從而陷入死氣沉沉的悖謬之中，成為更為陳舊的歷史過程的一部分。那麼，更換、拓展、深化問題的提法是否可能？譬如說，甚麼是「真實」或者「真相」？「真實」為何並何以成為權力的對象或權力操作的領域？「真實」或「真相」如何並通過何種渠道轉換為話語？權力如何左右這些渠道並因此產生了甚麼作用？「新聞」和「小說」作為轉換方式（或曰「策略」）與當代中國的知識範型又是何種關係？回答這些問題勢必要求我們對近代以來中國知識範型、權力網絡、傳播媒體等等的轉換和斷裂作一詳盡的歷史描述與分析，這是本文目前尚難承擔的任務。我現在想做的是通過一二個案的分析將歷史情勢「帶入」其中，以此表明「真實」向話語轉換（經

由媒體）呈現為「小說」或「新聞」等形態這一過程的複雜性，表明「壓抑機制」只是現實權力運作總戰略的一部分，表明權力並非「真實」的對立面，毋寧說正是那個無法觸及卻又無所不在的「真實」的產物，反過來說也一樣，權力正是「真實」的內在條件，存在於「真實」向話語的轉換之中。

真實 / 知識 / 權力

在這裏我想把「真實」定義為身處具體歷史境況中的人們的一種狀態及其對此狀態的一種體認（儘管我們明明知道在這一如此粗糙的定義中，「真實」已然逃遁於無形）。在此種體認向話語的轉換中，所謂「真實」既包括「言過其實」中的「實」，亦涵蓋了「修辭立其誠」中的「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中的「信」，以及「辭達而已矣」中的「達」，——包含了認識論和道義倫理以及作為「效果」的功利論等種種方面。古人對這些方面的種種考慮在此無法分梳，我只想指出到了近代中國，諸如「原理」、「本質」、「規律」、「必然性」等概念的確立，標誌着一種全然不同的知識範型的產生，傳統之所謂「實」、「誠」、「信」、「達」種種，亦只能納入「客觀真理」、「整體真實」一類的範疇體系中重作闡釋了。1902年，梁啟超在他創辦的《新小說》第一號上撰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極力推崇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其着眼處，並非要發展一種「純文學」，而在於小說能以「熏、浸、刺、提」四種力「支配人道」，遂成「新一國之民」乃至「新一國之政治」的關鍵。令人感興趣的是梁啟超強調小說（尤其是「寫實派小

「壓抑機制」只是現實權力運作總戰略的一部分，權力並非「真實」的對立面，毋寧說正是那個無法觸及卻又無所不在的「真實」的產物。

說)在「摹寫情狀」方面,「能極其妙而神其技」,「感人之深,莫此為甚」,隨後他立即援用「近代科學原理」加以解釋:「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之自然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當英國人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似應譯作「權力」?)」時,指的是以順服自然規律的狡猾方式來征服自然。梁啟超們為了用從西方尋得的真理「開放民智」,不惜遷就粗人們的「人類之普通性」,遵循的正是同一思路。後來毛澤東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說延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家「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寫出「更高、更典型、更真實、更集中、更感人」的作品,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把「真實/知識/權力」之間的關係,闡釋得更為透徹明瞭,並聚集到更為明確的「革命功利主義」目標上。

「真實」並非權力所一味壓制之物,確切些說,「真實」是權力得以運作的領域。當代中國的權力網絡對人們「對自身具體歷史境況的體認」抱有空前濃郁的興趣,歷次運動的基本任務之一便是要求人們寫自傳、寫交代、向黨交心,「暴露思想」,「亮私鬥私」,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人們幾乎是被迫將「真實」轉換成話語,而且,人們被捲入的廣度以及話語的量的積累,都是空前絕後的。話語被記錄在案,匯編成冊,有時候擇其重要者,或是以中央文件方式逐級傳達,或是披露極端發動群眾性的批判。結果正如福柯談到十七世紀歐洲「性」的告解懺悔時那樣,「真實」受到了壓抑,也受到了傾聽,權力在逐它們於

邊緣的同時積累了它們也傳播了它們。想像一下轉換成話語的「真實」在無數局部的權力網絡裏形成、積累、匯聚的情形,或是以「內參」、「簡報」的方式,或是以「小道消息」的方式,它們互相加強、削弱、衝突、協調,卻為當代中國的文化知識範型所統攝。很容易理解,報刊媒介上的「重大新聞」往往不是那些「東風萬里,捷報頻傳」的喜慶消息,而是局部網絡中的一些特殊話語的突然向全民曝光。在話語的轉換、積累和流通過程中,「小說」方式與「新聞」方式的分野其實並不重要,策略的靈活運用往往是以小說的想像力產生具有新聞效果的「真實」話語。反過來,小說家的創作,亦習慣性地被視為某一「個體真實」的曲折呈現,一經發表,其身分就變得微妙,它那些難以完全被權力網絡過濾的「個體真實」卻被合法傳播,一旦與每一身處具體歷史境況中的個體碰撞,其效果可想而知。不難想像權力捕捉到這一類小說時既震怒又興奮的心情,其中,興奮往往多於震怒。一場「真理—謬誤」的貓鼠遊戲開始了。權力並不簡單指斥話語為偽,恰好相反,它要挖掘其中的「真」(如「反黨動機」之類)並確定其位置和性質。後來權力者不太明白為甚麼每一部被批判的作品都身價百倍,其實那價值正由這遊戲所賦予——「不值一駁」的東西是不會去駁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報導失實」的事情並不引人注目(誰在乎某地水稻的畝產量是萬斤還是九千斤呢),小說的「違反真實」,或是用「自然主義的真實」取代了「現實主義的典型真實」,卻始終是批評界聚訟無休的話題。正是在這些論辯中,「真實」分裂了,分裂成兩瓣乃至更多的碎片(「整體真

當代中國的權力網絡對人們「對自身具體歷史境況的體認」抱有空前濃郁的興趣,人們幾乎是被迫將「真實」轉換成話語。

小說與新聞之間文類劃分的自我消解,已不是解構主義理論家的思辨遊戲,而是每日每時發生着的話語實踐。

實」，「局部真實」，「本質真實」，「表象真實」，「效果真實」，「動機真實」，「可略加暴露的真實」，「需大力歌頌的真實」等等等等），權力促成了「真實」的多元化。實際上，權力在鼓勵「新聞」擁有虛構的特權的同時，亦努力將「小說」改造成「新聞」。讀70年代初上海出版的長篇小說《虹南作戰史》，滿頁的黑體字（「毛主席語錄」）會使任何一位「純文學」的捍衛者精神錯亂（但「精神錯亂」又正是地道的「文學效果」）。又有多少海內外的中國人以豐富的想像力細讀《人民日報》上的每一篇枯燥乏味的社論和報導，端詳版面和新聞照片，發覺字裏行間暗藏玄機，遣詞造句多有深意。小說與新聞之間文類劃分的這種自我消解，已不是解構主義理論家的思辨遊戲，而是每日每時發生着的話語實踐。在這裏，我想簡略討論兩個相當有趣的個案，一個發生在70年代末，一個發生在80年代末。它們都充分顯現了「小說／新聞」、「真實／虛構」在當代中國「知識—權力」系統中的複雜運作狀況。

〈我該怎麼辦？〉

1978年的夏天，北京西單「民主牆」上，有一張題為〈政府，我應該怎麼辦？〉的大字報分外引人注目。它以一個女人的口吻，訴說「文革」中的遭遇和眼下面對的天大難題：丈夫被打成「反革命」後，單位送來遺物稱他已「畏罪自殺」，她走投無路，亦跳了河，幸被一忠厚男子所救，後兩人結為夫妻，艱難度日，不料「四人幫」倒後，前夫死而復活，平反歸來，如今不知怎麼辦，但求政府作主則個。大

字報無署名，亦未具寫地址，難以判斷是否實有其事。翌年(1979)，廣東的文學雜誌《作品》二月號發表陳國凱的短篇小說〈我該怎麼辦？〉，其靈感是否來自上述著名大字報，不得而知，但情節故事基本一致。小說發表後反應強烈。先是報紙轉載電台連播，隨後當地黨報《南方日報》與《作品》均刊載激烈批評的文章，電台趕忙停播，外地紛紛傳聞《作品》編輯部和作者都正在作檢討。與此同時，編輯部和作者收到全國一千多封讀者來信，「除七八篇對小說持批評和否定意見，十多篇對小說的藝術構思、人物描寫提出商榷意見外，其餘都是表示讚揚和支持的。」②

批評家指責陳國凱「挖空心思設計了許多純屬偶然的情節」，是「對歷史的篡改，對事實的歪曲」③。許多讀者的看法則是另一極端：「有的讀者把小說中的人物當作真人真事，要求作者把薛子君等人的通訊地址告訴他們，要和薛子君等人通信聯繫；有些讀者則直接給薛子君寫了信，委托作者轉交給她。齊齊哈爾市的一位讀者來信說：「……小說最後給我留下的玄案我想真是沒辦法了……最近幾天聽到了結果才心裏頓覺一喜。據說，子君有個表妹還沒嫁人，後來嫁給亦民了，子君和麗文重圓，孩子是各人帶各人的。這個結局倒令人滿意……」④這位實心眼的讀者甚至考慮到了「孩子歸誰帶」這樣實在的問題。事情並未到此為止，真正敲了批評家當頭棒的是海南島一位中學女教師給作者的信，講了一個與小說幾乎完全一樣的自身遭遇。最精彩的是隨信附來的一份《海口市人民法院民事調解書》(市法民事76號)⑤：

……自粉碎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後，撥亂反正，黨的各項政策得到進一步的落實。新的喜訊傳來，劉意鶴的原夫張士廉沒有死，他還活在人間，久經折磨的張士廉盼望早日重圓，悲喜交集的劉意鶴的心頭再也平靜不下來，思緒萬千，到底該怎麼辦好啊！張泰安對張士廉的處境和願望深感同情，對劉意鶴的正義呼聲表示支持。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後的張泰安提出：目前論困難張士廉比我大，論條件我比張士廉強，在處理婚姻家庭問題上，當年正出於階級同情感而與劉意鶴結合在一起，今天，同樣對心靈和肉體飽經折磨的張士廉出自內心的同情，毅然決定同意與劉意鶴離婚，讓張士廉早日重圓；對婚後所生女孩雙方同意各人負責撫養一個。

以上協議本院予以照准，以共產黨員高貴品質所譜寫的婚姻家庭的典範，表示支持，本協議與判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希雙方遵照執行。

這篇充滿文學色彩的判詞呈現出來的「真實」顯然跟批評家心目中的「真實」具有同質性，陳國凱卻成功地引來反擊了批評家。從「准新聞」（大字報）到短篇小說到「文學批評」到讀者來信再到法院判詞，關於某一種「真實」的話語在不同的局部權力網絡中流轉，我們看到即使用同一種語言敘述的「真實」，在不同的局部網絡中亦會有截然相異的功能。話語的生產與消費促成了一組組力量關係的重新組合、對抗、協調、分化，反過來說也一樣，這些組合、對抗、協調、分化左右着話語的生產與消費。同時我們還看到更深刻的權力運作是同一種意識形態語言對論辯諸方的控制，甚

至，這種控制並不能完全從消極方面去理解，正是它才使得「真實」成形、呈現並轉換為可以交換的話語。如此種種都是「壓抑機制」說所看不到的。「壓抑機制」說將權力視為從一個「只會說「不」」的中心點向四面施加煌煌炎威，而不是匯自四面八方的極為複雜互相衝突的戰略情勢。它看不到對抗權力的那些阻力點也是權力戰略的組成部分，看不到它們在同一知識—文化範型的統攝下使用或同或異的語言，看不到權力即由此種語言所產生。看到這些，身處每一局部網絡的具體個人，還會將「壓抑」全部推給那個獨一無二的中心點，活得一身輕鬆麼（儘管仍一面嚷嚷着沉重的壓抑）？看到這些，我們還會天真地相信，一旦祛除壓抑，大聲說出（用何種語言？）「真實」的新時代就會降臨麼？

〈大陸人〉

另一個案時距較近，且傳播的範圍比上述例子要廣泛得多，轉述起來或許不那麼費筆墨。1990年3月29日，上海《文匯報》先登一文，後又於4月2日的《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說的是大陸女作家遇羅錦自1986年在西德要求政治庇護後求生艱難，先後與一法國足球運動員、一大學生、一郵局公務員同居，皆遇人不淑，很是淒慘。後幸好結識一法國百萬富翁，大獻殷勤，終於結了婚。婚後才發現此翁極吝嗇，等於當了他無分文收入的僕人兼不用付錢的「妓女」。遇羅錦憤而自殺，卻被及時救活，從此過着貌合神離苦海無邊的日子。全文妙處是在結尾時點出「六四」後逃亡的學生學者，

「壓抑機制」說看不到對抗權力的那些阻力點也是權力戰略的組成部分，看不到權力即由此種語言所產生。



圖 極具諷刺的是，遇羅錦從前大膽自敘的作品被看作「精神污染」屢遭查禁，如今胡亂編造的故事卻改編成愛國主義教材由官家廣為傳播。

一旦被人「玩厭」，亦會如遇女士一般，被洋人們「棄之如糞土」，「狗屁不如」。此文後來又有多家報刊轉載，大加傳揚，直令百姓們欽羨不已：百萬富翁畢竟是百萬富翁嘛◎。

殺風景的是，這則情節離奇的新聞竟是依據遇羅錦的小說〈大陸人〉（台灣《聯合文學》1988年10月號）改編的。細究起來，改編也不是毫無因由。遇羅錦在大陸時發表的東西，幾乎全部是她命名為「真話小說」而正統批評家斥之為「隱私文學」的自傳性作品，也難怪人們從此就把她的所有寫

作一概視為現身說法。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遇羅錦從前大膽自敘的作品被看作「精神污染」屢遭查禁，如今胡亂編造的故事卻改編成愛國主義教材由官家廣為傳播。然而我想在這裏討論的卻是，整個話語的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無論其表述形式是所謂「小說」還是「新聞」，一整套由「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讓我們權且沿用這個術語）在中國近一個世紀的傳播所構成的傳統，如何制約了對異邦「真實」的漢語轉換。我們再一次看到遇羅錦和她的改編者們（再添上讀者



圖 殺風景的是，這則情節離奇的上海《文匯報》先登一新聞，竟是依據遇羅錦的小說《大陸人》改編的。

們)，如何在同一個「知識—權力」範型中敘述和閱讀，使之在不同的局部網絡中發揮不同的功能。

在分析前一個案時暫且按下不表的一個問題我想在此合併討論。我們或許注意到兩篇小說中原本存有的極重要的那部分「真實」——「女性真實」，在轉換為批評家的論辯、法院的判詞或政治雜文家的愛國主義教材（乃至我在這篇論文的概略性轉述）時，全都湮沒為閱讀與敘述的「盲區」。作為父權制社會的產物、基礎及表徵之一的語言又一次展示為權力運作的領域。在《大陸人》向政治新聞的轉換中，「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對女性的同情——消泯得一乾二淨，代之以狹隘而愚蠢的一種蔑視。更進一步，將流亡者比作「狗屁不如」的風塵女子，「性」與「政治」的此種天然結合在此昭然凸顯（一個可資比較的例子是毛澤東痛斥梁漱溟時將他比作「楊貴妃」和「梁美

人」）。「性」狀態作為「真實」狀態的重要部分與鮮明特例，在向話語的轉換中呈現更為複雜多面的策略運用，亦更根本地被「人類」（男人）語言所統攝。多重力量關係（階級的、種族的、性別的、社團的）的糾集、分化、衝突和協調，在這些話語中要求我們使用比「壓抑機制」說更有效的解釋架構。

在「真實」的「大觀園」裏

「小說」和「新聞」這樣的題目難免將我們導向《紅樓夢》中的一副無奈且辛酸的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或許，對每一個身處具體歷史境況中的當代中國人而言，所謂「真實」或「現實」不過是一些巨大的「空」的符號，它因其「空」而無法觸及無法看見，又因其「空」而無所不在，成為一切行為的依據和出發

「性」狀態作為「真實」狀態的重要部分與鮮明特例，在向話語的轉換中呈現更為複雜多面的策略運用，亦更根本地被「人類」（男人）語言所統攝。

點，亦因其「空」而可以容納無數互不相容卻同樣為「真」的闡釋，更因其「空」而逼迫每一個人（用語言或別的甚麼）去捕捉它，坐實它，使之顯形，使之實體化，使之成為可在其中安身立命的「家園」。這些「空」（複數的）座落在現實權力網絡的點、結、縫中，流動，閃爍，變幻，遁形。多少年來，儘管懷疑論和虛無主義幾經冒頭，「寧信其有，莫信其無」依然是我們中國人最大的心理焦灼（試回想那一千多封熱淚漣漣的讀者來信，回想一下欽羨關於法國百萬富翁的浪漫故事的新閱讀者）。一個世紀以來人們被允諾用切實可靠的理性工具和科學原理，可以征服虛空，落實夢境。對在十八世紀寫下前引談真假論有無的精彩聯語的曹雪芹來說，後人給他的最大獎賞或最大嘲諷，莫過於用科學方法考證出「大觀園」的全部結構，並將它落實在北京的地面上。當你身處那「真實」的「大觀園」中時，會感到無論多麼偉大的夢境都已離你遠去，平庸虛假的「空」正從四面向你包圍而來。然而，經由話語爭奪、佔有、闡釋「真實」的權力運作，依然在無數的點與點之間生成、積累、擴散，永無休止。

1990年6月 — 1991年2月
於海德園

註釋

- ① 感謝傅大為先生提醒我注意到：幾乎所有「深層壓抑理論」（譬如弗洛伊德、馬克思）都與「烏托邦」理想有關係，都允諾了某種全面的解放。
- ② 〈《我該怎麼辦》發表以後〉，《作品》1979年第10期，頁64。

③ 咏華：〈文藝作品必須堅持典型性和真實性〉《作品》，1979年第8期，頁69。

④⑤ 陳國凱：〈他們這樣辦！〉《作品》，1979年第11期，頁3，6。

⑥ 蕭莉：〈寫藝和難民之間〉《九十年代》，1990年8月號，頁84。

* 論文曾以〈小說與新聞：當代中國知識、文化、權力和媒介〉為題，在夏威夷「文化與社會：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討論會（1991.2）發表。現經吸收會上討論意見，修改擴充，深表謝意。

黃子平 廣東梅縣人，1949年出生。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曾出版論文集《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文學的意圖》等。近年來發表有關文學和文化方面的評論文章有〈關於「偽現代派」及其批評〉、〈小說：「尋根」與「實驗」〉、〈千古艱難唯一死〉、〈語言洪水中的壩與碑〉、〈表演，或者無所為〉、〈《故事新編》：時間和敘述〉等十多篇。參與編輯《中國小說1986》—《中國小說1989》以及《漫說文化》叢書等。現在芝加哥大學作訪問研究。